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亚述赋役制度考略

ASSYRIAN TAXES AND CORVÉE SYSTEM

—
国洪更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亚述赋役制度考略

ASSYRIAN TAXES AND CORVÉE SYSTEM

国洪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述赋役制度考略/国洪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902 - 6

I. ①亚… II. ①国… III. ①赋税制度—财政史—研究—西亚—
古代 ②徭役—财政史—研究—西亚—古代 IV. ①F813.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70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385 千字
定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序

国际学术界认为，1857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即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的四位权威楔形文字专家彼此独立地成功释读了同一份内容的楔形文字材料，证明了此前世界范围内楔形文字专家释读楔形文字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同时表明，以研究古代住在西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民族所创造和使用的楔形文字，以及用这种文字记述的历史和文化为目的的学术是具有科学内涵的。换句话说，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标志了亚述学的诞生和创立。

在中国，以研究楔形文字文献为基础的亚述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在以林志纯（笔名“日知”）为首的一些力主推进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老学者的赞助下，方才得以建立。

从1986年至今的二十多年内，通过中外学者的多方合作，中国有了为数不多的本国的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亚述学的学者，国洪更是其中之一。依我看，他是其中不急于追逐名利、学风端正、刻苦努力的一位。

国洪更的近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是他多年认真研读和翻译大量楔形文字文本文献，并且参阅四五百种外文文献和中文著作，不断思考、探索的结果。该书的问世，必将有益于中国的古代历史研究者，为其提供借鉴和启发，也将对关心、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热心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由于亚述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对于亚述学的研究者来说，掌握与这一学科有关的外国文字，可以说是多多益善。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能够阅读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国洪更，无疑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外语阅读能力。

苏联著名学者B. B. 斯特鲁威，由于能够阅读地中海东部地区诸多古代民族的文献，在仔细研读了苏美尔文献之后，于20世纪30年代即已认定

古代西亚地区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阶段。他在 1941 年出版的《古代东方史》中，反复说明了亚述在其国家存在的一千多年中，始终都是奴隶占有制社会。

国洪更由于不懂俄文，因而对苏联学者研究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方面的巨大成就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他这方面的弱点在他的《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有明显的反映。

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研究人员太少，缺门太多，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我衷心地希望像国洪更这样有志于研究“冷门”的中青年多起来，像《亚述赋役制度考略》这样的书多起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廖学盛' (Liao Xuesheng).

2015 年 1 月 12 日

引 言

赋役是赋税与徭役的合称，前者指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无偿地、强制地向民众征收的货币和实物的总称，^①后者指政府强迫民众负担的无偿劳动，包括兵役、劳役和杂役。^②尽管赋税征收的对象是物，徭役征调的对象是人，但是，二者的界限有时十分模糊，主要表现是可以交纳财物代替服役。为了履行其职能，国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作后盾，征调赋役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马克思曾将其概括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③国家是赋役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的存在依赖于赋役的征收，马克思曾将赋税与国家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④

一 选题意义

赋税和徭役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研究赋役制度是打开亚述国家之谜的一把锁钥。一方面，赋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其经济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而且关系到民众负担的轻重，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是国家财经制度的重要内容，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自然有利于进一步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赋役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民众进行的强制和无偿的索取，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认识其政治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影响和制约国家机构的运转效率，而且关乎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的盛衰。赋役制度是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把其政治制度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对正确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国家运转机制及

① 何盛明主编：《财经大辞典》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2页。

②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其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

赋役制度因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演变，追溯亚述赋役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演变历程的认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先后出现以城市为主体的城邦、囊括两河流域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国家和跨地区的帝国三种国家形态，亚述是该文明区唯一经历三种国家形态的政权，因此，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不但有助于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会促进该地区政治制度演变的了解。亚述文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缩影，既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共性，又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地区文明的特性，因而，从剖析亚述的赋役制度入手解读亚述文明还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认识。

亚述赋税制度研究属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内容，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现代史学观念出发的话，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从问题史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研究古代文明，比如亚述的赋税制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明，即对现代文明的产生、成长和成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可以得到许多来自于历史本身的启示，从而为更有效地全面发展现代文明提供历史经验。

二 研究综述

赋役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关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不胜枚举，大致可以分为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与涉及某一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两大类，其中后一类研究又可细分为涉及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关税、徭役、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豁免六种制度的研究。

（一）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亚述赋役制度种类繁多，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不止一项赋役制度，其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亚述学教授波斯特盖特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多部论著关注亚述的多项赋役制度。波斯特盖特在解析新亚述时期国王的赏赐敕令时，曾简介相关文献提及的 *nusāhē* 税^①、*šibšu* 税、*šibtu* 税、*bitqu* 税等税

^① 本书中的阿卡德语单词一律用斜体，苏美尔语单词和语符一律用正体。由于亚述的赋役名称很难译成汉语，加之，它们在不同时期差别较大，本书不按中国学术界的惯例译成汉语，而是按国际亚述学惯例只给其拉丁化形式。

赋以及 *ilku* 义务等徭役。^① 在此基础上, 波斯特盖特编辑整理了三百余篇涉及赋役制度的楔形文字文献, 出版《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一书, 系统地考察了新亚述时期的 *bitqu* 税、*ilku* 义务、*iskāru* 义务、*maddattu* 贡赋、*miksu* 税、*nāmurtu* 贡赋、*šibtu* 税、*nusāhē* 义务、*šibšu* 税等十余种赋役制度。^② 尽管《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出版已达 40 年, 但是, 该书仍然是对新亚述时期赋役制度最深入、最全面的剖析, 奠定了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后来, 波斯特盖特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经济结构时, 既介绍了 *ilku* 义务和手工业者的 *iskāru* 义务等徭役, 又提到了 *šibšu* 税和 *nusāhē* 税等种植业税, 还涉及对外贸易的 *miksu* 税。^③ 另外, 波斯特盖特在考察公元前 1000 年代前期亚述的土地保有与开发状况时, 曾提及与土地保有有关的 *šibšu* 税、*nusāhē* 税、*ilku* 义务及其豁免情况。^④ 其他学者的论著也涉及亚述的多种赋役制度。例如, 帕克研读亚述都城卡尔胡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 概述了新亚述时期民众负担的税收和劳役。^⑤ 贝德福德在考察亚述帝国的发展动力时, 强调了各种赋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⑥ 法伊斯特在考察公元前 14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亚述的长途贸易时, 不但介绍了与之有关的 *miksu* 税, 而且提到了附属国进献的 *maddattu* 贡赋和 *nāmurtu* 贡赋。^⑦ 费尔斯在考察新亚述的历史沿革和行政管理时, 不仅考察了 *šibšu* 税、*nusāhē* 税和 *miksu* 税等税赋的征收情况, 而且观察了 *ilku* 义务等徭役的摊派情况。^⑧ 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法律制度时, 曾述及亚述的 *šibšu* 税、*nusāhē* 税

① J. N. Postgate, *Neo-Assyrian Royal Grant and Decrees*,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69, pp. 9-16.

② J. N. Postgate, *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 Rome: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1974.

③ J. N. Postgat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M. T. Larsen, ed., *Power and Propaganda: A Symposium on Ancient Empires*,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79, pp. 203-207.

④ J. N. Postgate, "The 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Land in Assyria in the 1st Millennium B. C.", M. Lebeau et P. Talon, eds., *Reflets des deux fleuves: Volume de mélanges offerts à André Finet*, Leuven: Peeters, 1989, pp. 149-151.

⑤ B. Parker, "The Assyria Civil Service", *Sumer*, Vol. 16 (1960), pp. 32-38.

⑥ P. R. Bedford, "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I. Morris and W. Scheidel, eds.,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65.

⑦ B. I. Faist, *Der Fernhandel des assyrischen Reiches zwischen dem 14. und 11. Jh. V. Chr.*, Münster: Ugarit Verlag, 2001, pp. 184ff., 191ff., 42, 229, 22, 34, 58, 95.

⑧ F. M. Fales, *L'impero Assiro: Storia e Amministrazione (IX-VII secolo a. c.)*, Roma and Bari: Laterza & Figli Spa, 2001, pp. 189-202.

等税赋和*ilku*义务。^①

(二) 涉及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1. 涉及农业税的研究

农业税是亚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亚述学家的研究涉及亚述的农业税。种植业税与土地保有有关，埃利斯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的 *šibšu* 税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② 亚斯在研究两河流域北部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介绍了亚述有关文献提及的 *nusāhē* 税和 *šibšu* 税。^③ 山田成夫在考察新亚述帝国边境的商业据点 (*kāru*) 时，曾提及新亚述时期的 *miksu* 税涵盖 *nusāhē* 税和 *šibšu* 税等种植业税。^④ 此外，丹达马耶夫在探讨新巴比伦时期的 *šibtu* 税官时，提到了新亚述时期的牲畜税 *šibtu* 税。^⑤

2. 有关贡赋的研究

交纳贡赋是附属国对宗主国应尽的重要义务，亚述的贡赋制度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在提及亚述的文献或其附属国的情况，均注意到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例如，约翰斯在介绍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法律文本、契约和书信时，关注到亚述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⑥ 科根在分析亚述对犹太和以色列的掠夺时，曾论及亚述向附属国摊派的贡赋；^⑦ 扎卡尼尼在追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贡赋制度的渊源时，曾涉及亚述征收贡赋的

① Karen Radner, "Neo-Assyrian Period", in R. Westbrook, ed., *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Vol. II,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3, p. 899.

② M. deJ Ellis,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and Tenure*, Philadelphia: Occasional Publication of the Babylonian Fund No. 1, 1976, pp. 102, 138 - 145.

③ R. M. Jas, "Land Tenur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Old Sources and Modern Environment", in R. M. Jas, ed., *Rainfall and Agricultur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Leiden: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 2000, p. 255.

④ Shigeo Yamada, "Kārus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Orient*, Vol. 40 (2005), p. 78.

⑤ M. Dandamaev, "The Neo-Babylonian *rab šibti*", in J. Marzahn und H. Neumann, hrsg., *Assyriologica et Semitica: Festschrift für Joachim Oelsner anlässlich seines 65. Geburtstages am 18. Februar 1997*, Münster: Ugarit Verlag, 2000, pp. 29 - 31.

⑥ C. H. W. Johns,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Laws, Contracts and Letters*, Cambridge and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4, p. 157.

⑦ M. Cogan, *Imperialism and Religion: Assyria, Judah and Israel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B. C.*,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1, pp. 121 - 132.

情况;^① 利韦拉尼在梳理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王室铭文中的地理信息时,还考察了亚述帝国西部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② 塔德莫尔在编译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王室铭文时,还整理了进献贡赋的西部附属国清单;^③ 真蒂利在分析亚述帝国宫廷的财物分配状况时,曾涉及从附属国征收的多种贡品。^④ 通过比较苏美尔—巴比伦尼亚与埃及的贡赋制度,马丁界定了亚述贡赋的一些基本概念,奠定了贡赋制度研究的基础。^⑤ 一些学者曾关注交纳贡赋的意义和作用。例如,贝尔研究了浮雕等直观材料上描绘的附属国进献贡赋的情景,指出缴纳贡赋是被征服地区臣服的重要标志;^⑥ 苏联学者扬科夫斯卡在梳理亚述的王室铭文提及的贡赋和战利品时,指出亚述凭借武力取得的霸权支配了西亚北非地区的物资交换,征收贡赋取代贸易成为该地区物资交换的主要方式。^⑦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将亚述的贡赋进行了分类。例如,埃拉特开创性地将亚述的贡赋分为“投降贡赋”(tribute of submission)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普通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后者多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并指出贡赋的征收与战利品的掠夺是造成亚述帝国西部地区经济凋敝、人口稀疏的重要原因;^⑧ 山田成夫在研究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帝国的建构过程时,将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分为“现场贡赋”(spot tribute)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并提出征收贡赋、掠夺战利品是亚述军事扩张的

① C. Zaccagnini, "Pre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Tributary System", in P. Briant et C. Herrenschildt, eds., *Le Tribut dans l'empire Perse*, Paris: Peeters, 1989, p. 193ff.

② M. Liverani, *Studies on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II, Part II: Topographical Analysis*, Rome: Università di Roma "La Sapienza", 1992, pp. 155 - 162.

③ Hayim Tadmor, *The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King of Assyria*, Jerusalem: 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94, pp. 265 - 267.

④ Paolo Gentili,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Palatin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 *SAAB*, Vol. 14 (2002 - 2005), pp. 104 - 107.

⑤ W. J. Martin, *Tribut und tributleistungen bei den Assyryern*, Helsinki: Societas Orientalis Fennica, 1936.

⑥ J. Bär, *Der assyrische Tribut und seine Darstellung: Eine Untersuchung zur imperialen Ideologie im neuassyrischen Reich*, Kavelaer: Butzon und Bercker, 1996.

⑦ V. A. Jankowska, "Some Problems of the Economy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I. M. Diakonoff, ed., *Ancient Mesopotamia: Socio-Economic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by Soviet Scholars*, Mosc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1969, pp. 253 - 274. 扬科夫斯卡的文章完成于1947年,刊于 *Vestnik Drevny Istorii* 1956年第1期,第28—46页,1969年英文译文收录于上述论文集。

⑧ M. Elat, "The Impact of Tribute and Booty on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in the Assyrian Empire", *AfO*, Beiheft Vol. 19 (1982), pp. 244 - 251.

根本目标之一。^①

3. 提及关税的研究

对外贸易是亚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税负也受到亚述学家的关注。古亚述以对外贸易而闻名，关税是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关学者在论及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或相关文献时多提及其税负。例如，莱维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各种制度时，曾论及亚述商人缴纳的 *wašitum* 税和 *išratum* 税等税负；^② 拉森在介绍古亚述时期商队的运作时，提到了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需负担的 *nish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 *wašitum* 税等税负；^③ 奥林在考察卡帕多西亚地区亚述商业据点的基本状况时，曾述及阿淑尔商人负担的 *nish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 *išratum* 税等税负；^④ 韦恩霍夫在全面评估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时，*wašitum* 税和 *šaddu' âtum* 税等税赋也在其考察之列；^⑤ 德克森在研究古亚述商业据点的管理机构时，曾提及名年官和商业据点的书吏等人员征收 *waši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 *išratum* 税等税赋的情况^⑥；斯特拉特福德在介绍阿淑尔商人沙里姆-阿胡姆的商业活动时，曾提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经商的阿淑尔商人需要负担的多种税负；^⑦ 罗森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契约时，曾注意到有关文献涉及的 *išratum* 税和 *šaddu' utum* 税等税负。^⑧ 一些学者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商业活动时，也涉及商业税的征收情况。例如，埃拉特在考察两河流域帝国阶段腓尼基人的陆

① Shigeo Yamad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lmaneser III (859-824 BC) Relating to His Campaigns to the Wes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pp. 236-250.

② L. Lewy, "On Some Institutions of the Old Assyrian Empire", *HUCA*, Vol. 27 (1956), pp. 32-38.

③ M. T. Larsen, *Old Assyrian Caravan Procedures*, 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 1967, pp. 142-144.

④ L. L. Orlin, *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 Paris: Mouton & Co. N. V., 1970, p. 60 note 89.

⑤ K. R. Veenhof, *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 Leiden: E. J. Brill, 1972, pp. 278-285.

⑥ J. G. Dercksen, *Old Assyrian Institutions*,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4, pp. 110-116.

⑦ E. P. Stratford, *Agents, Archives and Risk: A Micronarrative Account of Old Assyrian Trade through Šalim-Ahum's Activities in 1890 B. C.*,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41-48, 81-90.

⑧ B. L. Rosen, *Studies in Old Assyrian Contracts*, PhD Dissertation of Brandeis University, 1977, pp. 53, 98, 99.

路贸易时，曾提到亚述在附属国设置商业据点征收 *miksu* 税的情况；^① 金泰勋在剖析公元前 8 世纪和公元前 7 世纪亚述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的政治经济关系时，注意到亚述在相关地区征收关税的情况。此外，埃利斯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表示关税术语 (*miksu*) 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时，提出该词在古巴比伦时期可以指农业和商业方面的税收，而在新亚述时期则仅仅指对外贸易方面的税负。^②

4. 论及徭役制度的研究

徭役是国家获得兵员和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徭役制度。许多学者注意到 *ilku* 义务是亚述最重要的徭役，强调该义务与土地保有有关。例如，波斯特盖特在考察中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制度时，明确指出中亚述时期的 *ilku* 义务与保有土地之间的关联，并强调兵役是其重要内容；^③ 波斯特盖特再次辨析中亚述时期的 *ilku* 义务与土地保有权的关系时，重申中亚述时期的 *ilku* 义务是一种与土地保有有关的兵役义务，并指出该义务可以通过缴纳财物来代替服役；^④ 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指出土地保有者需要负担 *ilku* 义务；^⑤ 迈德曼在剖析努兹地区的文献及其史料价值时，分析了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 *ilku* 义务的性质及其与不动产的关系。^⑥ 一些学者关注了 *ilku* 义务与军队的关系。例如，波斯特盖特在研究扎穆阿行省的军队时，提出履行 *ilku* 义务的“国王的士兵” (*šāb šarri*) 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也可以参加公共工程建设；^⑦ 马蒂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朝廷高官麾下军队的来源时，断定行省军队主要是由履行

① M. Elat, "Phoenician Overland Trade within the Mesopotamian Empires", in M. Cogan and I. Eph'al, eds., *Ah, Assyria... 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ry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to Hayim Tadmor*,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1991, pp. 25 - 26.

② M. deJ Ellis, "Tax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Miksu*", *JCS*, Vol. 26, No. 4 (1974), p. 246.

③ J. N. Postgate, "Land Tenure in the Middle Assyrian Period: A Reconstruction", *BSOAS*, Vol. 34, No. 3 (1971), pp. 496 - 501.

④ J. N. Postgate, "*Ilku* and Land Tenure in the Middle Assyrian Kingdom: A Second Attempt", in M. A. Dandamaev et al., eds., *Societies and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r of I. M. Diakonoff*, Warminster: Aris and Philips, 1982, pp. 303 - 311.

⑤ K. Radner, "How did the Neo-Assyrian King Perceive His Land and Its Resources?" in R. M. Jas, ed., *Rainfall and Agricultur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p. 243.

⑥ M. P. Maidman, *Nuzi Texts and Their Us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0, pp. 168 - 169.

⑦ J. N. Postgate, "The Assyrian Army in Zamua", *Iraq*, Vol. 62 (2000), p. 106.

ilku 义务的人组成的。^① 普法伊费尔在分析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 *ilku* 义务时, 将其称为封建制度, 并指出它主要指强迫劳动。^② 还有学者介绍了亚述其他类别的徭役。例如, 西莫·帕尔波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遍及全国的交通网时, 还论及御道上驿站的服务 (*kalliu*);^③ 德勒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商业借贷关系时, 曾分析与商业代理人有关的 *iškāru* 义务;^④ 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 *širku* 义务时, 还涉及新亚述时期的 *iškāru* 义务, 并称其为一种手工业者和牧人负担的税收。^⑤

5. 涉及神灵供品的研究

亚述的神灵也具有人类一样的需求, 奉献神灵的供品引起多位亚述学家的兴趣。学者们在介绍亚述神灵的情况时, 多提及献给神灵的供品。例如, 范-德里尔在研究祭祀阿淑尔神的仪式时, 谈到了奉献该神的各种供品;^⑥ 波斯特盖特在给门策尔的专著《亚述神庙》撰写的书评中, 解释了奉献神灵的 *rēštu* 供品的相关情况;^⑦ 兰伯特在介绍古代两河流域人向神灵奉献的食物和饮料时, 也提到了新亚述时期向神灵奉献的供品;^⑧ 马克在比较新亚述时期的预言与希伯来圣经时, 也涉及亚述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⑨ 若尔瑙伊在分析女神伊什塔尔的职能时, 曾提及奉献给该女神的供品清单;^⑩ 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

① SAAS XI, p. 149.

② Robert H. Pfeiffer, "On Old Babylonian-Assyrian Feudalism (*ilku*)", *AJSLL*, Vol. 39, No. 1 (1922), pp. 66 - 68.

③ SAA I, p. xv.

④ K. Deller, "Tamkāru-kredite in neuassyrischer Zeit", *JESHO*, Vol. 30, No. 1 (1987), pp. 11 - 14.

⑤ A. Ragen, *The Neo-Babylonian Širku: A Social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p. 206 - 208.

⑥ G. van Driel, *The Cult of Aššur*, Assen: Van Gorcum, 1969, pp. 186 - 191.

⑦ J. N. Postgate, "Review of *Assyrische Tempel*", *JSS*, Vol. 28 (1983), pp. 155 - 159.

⑧ W. G. Lambert, "Donations of Food and Drinks to the God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J. Quaegebeur, ed., *Ritual and Sacrific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uven: Uitgeverij Peeters en Departement Orientalistik, 1993, pp. 195ff.

⑨ R. R. Mack, *Neo-Assyrian Prophecy and the Hebrew Bib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of Hebrew Union of College, 2010, pp. 192, 197.

⑩ I. Zsolnay, *The Function of Ištar in the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ctions of Attributed to Ištar in the Inscriptions of Ititi through Šalmaneser III*,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Brandeis, 2009, p. 236.

时,介绍了亚述的供品清单和“阿基图节”期间奉献神灵的供品。^①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亚述神灵供品的交纳方式。例如,科根在考察亚述帝国的统治策略与宗教的关系时,提到了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及其向征服地区摊派的情况;^②门策尔在介绍亚述神庙的祭祀仪式、组织管理和人员构成时,多次提及奉献神灵的各种供品;^③霍洛韦在分析宗教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时,介绍了行省总督、朝廷高官和被征服地区统治者向阿淑尔神奉献供品的情况,并提出交纳供品是他们顺从阿淑尔神和国王的一种表现形式;^④史蒂文斯在论证耶路撒冷神庙的经济角色时,曾提及亚述奉献神灵的 *hamussu* 供品;^⑤波特在分析古代两河流域神灵的性质时,曾述及亚述向神灵奉献的 *immeru dariu* 供品、*ginû* 供品和 *sattukku* 供品等供品;^⑥苏乔曼在剖析中亚述时期哈尼伽尔巴特与阿拉米人崛起时,介绍了中亚述行省向神庙奉献的供品;^⑦加斯帕在还原中亚述时期的供品情况时,研究了 *ginû* 供品的交纳方式。^⑧

6. 有关赋役豁免的研究

赋役的豁免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赋役豁免情况。一些学者介绍了亚述各类赋役豁免的基本情况。例如,萨格斯在诠释所谓的“阿淑尔宪章”(Aššur Charter)时,揭示了萨尔贡二世豁免阿淑尔城居民赋役的情况;^⑨哈诺赫·雷维夫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城市

① J. Bidmead, *The Akitu Festival: Religious Continuity and Royal Legitimation in Mesopotamia*, New York: Gorgias Press, 2002, pp. 8, 148.

② M. Cogan, *Imperialism and Religion: Assyria, Judah and Israel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B. C.*, pp. 67, 81, 116.

③ Brigitte Menzel, *Assyrische Tempel*, Rome: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1981, Sachindex 16.

④ S. Holloway, *Aššur is King! Aššur is King! Religion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 London, Boston and Köln: Brill, 2002, pp. 100ff.

⑤ M. E. Stevens, *Tithes and Taxes: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Jerusalem Temple in Its Ancient Near Eastern Context*,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2, p. 98.

⑥ N. B. Porter, “Feeding Dinner to a Bed: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God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SAAB*, Vol. 15 (2006), pp. 311f., 319.

⑦ J. J. Szuchman, *Prelude to Empire: Middle Assyrian Hanigalbat and the Rise of the Aramaeans*,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7, p. 25.

⑧ Salvatore Gaspa, “The *rab ginâ’ e’*’s Administrative Unit at Work: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Provision of Foodstuffs in the Middle Assyrian Period in the Evidence of the Tabular Lists”, *UF*, Vol. 43 (2011), pp. 162–221.

⑨ H. W. F. Saggs, “Historical Texts and Fragments of Sargon of Assyria I. The ‘Aššur Charter’”, *Iraq*, Vol. 37, No. 1 (1975), pp. 19–20.

的 *kidinnu* 特权时，也注意到亚述国王豁免有关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① 摩西·魏因费尔德在研究古代以色列与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公正时，提到了亚述帝国国王豁免有关人员的地产和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② 一些学者还论及赋役豁免的目的与动机。例如，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时，还指出亚述国王赐予许多城市免赋役的 *kidinnu* 特权，以换取城市居民的支持；^③ 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 *širku* 义务时，也注意到新亚述诸王通过慷慨的赏赐和豁免赋役来赢得神职人员拥戴的情况；^④ 笔者在辨别亚述帝国的“拉科苏”（*raksu*）士兵的身份时，提出豁免赋役是亚述获得常备军的一种途径。^⑤

综上所述，无论是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还是关注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亚述赋役制度的不同方面，有关学者的真知灼见奠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基础。然而，尽管涉及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为数不少，但是，除了波斯特盖特等学者的少数论著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探讨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而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第一，以往的研究涉及新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相对较多而且深入，而对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们需要打破时间界限以追溯各项赋役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第二，以前的研究考察了亚述的许多种赋役制度，但仍有一些赋役制度，诸如神灵的供品、贡赋制度中的 *biltu* 贡赋、*igisû* 贡赋、古亚述时期关税中的 *išratum* 税、*šaddu' âtum* 税和 *wašitum* 税、新亚述时期兵役中的 *dikût mâti* 义务、劳役中的 *tupšikku* 义务、与 *iškâru* 有关的劳动以及 *kalliu* 义务等均未曾被系统地研究过，因此，我们要扩展研究对象以全面地评估亚述的赋役制度。

三 研究方法

史论结合的方法。本书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① Hanoch Reviv, "Kidinnu Observations on the Privileges of Mesopotamian Cities", *JESHO*, Vol. 31, No. 3 (1988), pp. 286-291.

② Moshe Weinfeld, *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an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1995, pp. 102, 109, 137.

③ J. Bidmead, *The Akîtu Festival: Religious Continuity and Royal Legitimation in Mesopotamia*, pp. 59-60.

④ A. Ragen, *The Neo-Babylonian Širku: A Social History*, p. 590.

⑤ 国洪更：《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和方法，把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置于古代两河流域及亚述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中，从而探讨赋役制度本身的内容及其特点与规律。其一，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随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只有将其放到亚述自身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分析探讨，才能准确把握其产生与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其二，从共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两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影响与启发，尤其是该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属于后进区域，南部的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刺激了亚述相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必须置于视野辽阔的两河流域历史发展进程中，以考察更为丰富广泛的地域文明的特点，同时还要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赋役制度的普遍规律。本书不仅要追溯亚述赋役制度自身发展历史演变的历程，而且要探讨其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使赋役制度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紧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来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

文献研究的方法。亚述赋役制度属于亚述学研究的范畴，该学科是一门通过释读相关楔形文字文献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解读相关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多达数十万，涉及亚述历史的文献数以万计，从中筛选出与亚述赋役制度有关的文献是本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古代两河流域的绝大多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没有经过古代学者的编辑，基本术语也没有经过后世学者的训诂，甄别史料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重要任务。亚述没有留下关于征调赋役的成文法律，梳理各类涉及赋役制度的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主要目标。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的考证，即对史料进行批判，通过内证和外证以及史料相互印证来选取可信、合适的材料。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一般书写在易于破碎的泥板上，大多残缺难辨，研究者需要利用语言学知识修复破损文献，借助考古学信息确定文献的类别，因此，本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对相关史料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对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合、提炼，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深入研究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理论的指导，将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 and 材料有机地统一于赋役制度研究之中，以彰显这一研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显然，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对于本研究具有明显